

[联邦德国] 爱丽丝·史瓦兹 著

台湾 顾燕翎 梁双莲 等译



拒绝做 第二性的女人

西蒙·波娃访问录

35.6556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西蒙·波娃的《第二性》是西方现代女性主义的宝典。半世纪来，她的智慧与实践不断启发着世界的男女。

《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》一书涵盖波娃最后三十年的生活与思想。她坦诚地谈到她和萨特的关系，谈了她创作《第二性》的感想及遭到的攻讦，谈了哲学、婚姻、性爱及妇女运动等话题，是波娃生前最后的，也是最精彩的访谈录。

ISBN 7-5057-0205-X/K·34

定 价：

1.90元

K835.

7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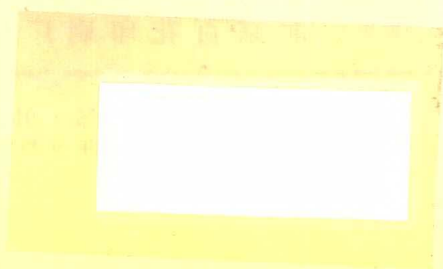
拒绝做 第二性的女人

西蒙·波娃访问录

[联邦德国] 爱丽丝·史瓦兹 著

台湾 顾燕翎 梁双莲 等译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 [联邦德国]爱丽丝·史瓦兹著
台湾顾燕翎、梁双莲等译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4 $\frac{3}{8}$ · 91,000

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ISBN7-5057-0205-X/K · 34 定价：1.90元



波娃与萨特半个世纪来经常一起工作，为相同的目标奋斗。



在马赛当哲学教师时的波娃。



萨特(最左)和波娃(最右)与友人在咖啡厅相聚。

责任编辑：张云梅

装帧设计：劭 长

勤 卓

1989 · 北京

目 录

前言	西蒙·波娃	1
作者简介		3
作者序	爱丽丝·史瓦兹	5
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		17
我们不是不可批判的		37
第二性：三十年之后		53
女人爬得低跌得轻		69
投这个世界的反对票		83
只做一个女人是不够的		93
跋《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》	李元贞	108
西蒙·波娃年谱		111
附录：		
没有萨特，是否有波娃？	傅伟勋	121
波娃与萨特——两个独立自主的存在	李元贞	129

前言

西蒙·波娃

爱丽丝·史瓦兹 (Alide Schwarzer) 对我所作的采访是在1972年初到1982年9月间进行的。我们既有私谊，又同为女性主义者，因此她能提出使我感兴趣的问题，我作答时也毫无保留。这些对话精确地记录了我在这段期间对女性主义所持的态度——这也是我至今秉持的态度。事实上，自从1970年我积极参与当时所谓新女性主义后，我的观念几乎不曾改变，只就女权运动的实务观点上做了少许修正。我所谓的实务包括：我与其他妇女的关系，妇女们写给我的诸多书信，我所参加的各种行动等等。我赞成用经验来塑造思想，起码这是我一贯的作风。所以阅读这本访问录，应按照进行访问的年代顺序，因为我的思想随着时间做了一些修正。

本书讨论的主题是我身为女性主义者所秉持的态度。但爱丽丝·史瓦兹也向萨特与我问及我们的关系，因此我觉得不妨对此多加说明。有些女性主义者以为：女人只要和一个男人密切挂钩，就不可能象她们那些女性主义者一样地奋战不懈。我不同意这种观点。我想说明这两者是可以并存的，至少在我的经验中是如此。我乐见本书出版，

它将使大众更了解我，也希望大家能因此更了解我所献身的目标。



作者简介

爱丽丝·史瓦兹 (Alice Schwarzer), 1942年生, 女性主义新闻从业人员, 也是西德妇女运动最有名的活跃人物。从1977年起, 她担任Emma杂志 (西德最早创刊及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杂志) 的主编及发行人。在法国妇女运动中, 她与西蒙·波娃共事了十年 (1972—1982) 而作成这些采访, 本书先以德、法文出版, 1984年译成英文出版, 书名为 *After the Second Sex: Conversation with Simone de Beauvoir*。本书即根据英文本译成。



作者序

爱丽丝·史瓦兹

我头一次见到她是在1970年，当时她的态度并不十分亲切。不过我那时是去访问萨特，碰巧遇见她的。那是1970年5月在巴黎。国家安全法庭在连连审讯左派政治犯，因为他们策动劳资纠纷及抗议活动。当时甚为流行侵占工厂以及扣押管理人员做人质。政府一方面加重刑罚（最多可判终身监禁），一方面加强警力。一些参与行动的激烈派年轻知识分子遭到逮捕或骚扰。有些人转入地下。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接受审讯的时候，在社会上引起激辩，而示威群众与警察也发生严重的街头冲突。

那时候我在巴黎担任特派员，主要是报导1968年5月事件所造成的影响，尤其是在工厂和社会方面。当时在德、法两国最热门的问题是“革命暴力”。个人是否有用革命暴力来抵抗暴力镇压的权利？有的话，以暴制暴的最大界限在哪里？

在那段时期，萨特公开同情左派，保护他们，并且替他们宣传。他是左派刊物《人民理想》的法定负责人，他在雷诺工厂门口散发传单，公然表示支持，并且就当时的审讯发表极受瞩目的评论，措辞尖锐，让政府深感不安。

在这些案子正在开庭的一天，他答应接受我的访问，谈“革命暴力”。所以我坐在他的公寓里，做半小时的访问。我们的热烈谈话将近结束的时候，有人用钥匙把门锁打开，来人正是西蒙·波娃。她不高兴地膘了我一眼，然后很快地，迹近不耐烦地，提醒萨特，他们得出席记者会。然后她坐在靠墙的书桌后面等，很不耐烦。我可以感觉出来她因为时间耽误了而十分不快，因此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到她的别扭劲。众所周知，她碰到不对劲的人或情况的时候，常常表现出冷淡的态度。很久以后，我体会到她不轻易妥协的个性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她一旦从心里接受一个人，也是不轻言放弃的。

访问结束后，我们三个人挤进狭窄的电梯，我小心地和波娃攀谈，她却根本无意答理我。

没关系。对我而言，与《第二性》*的作者面对面就已经够令人感动了。我的德国同事几年前就说过：“波娃点亮了一座灯塔，给本世纪后半的女性照亮了一条路。”在黑暗的五十年与六十年代，新的妇女运动尚未降生，《第二性》就象是我们这些正要觉醒的妇女之间彼此传递的暗语。而西蒙·波娃本人、她的一生、她的作品都成了一种象征，象征着即使是一个女人，也可能突破所有的阻碍，冲破习俗与偏见的限制，按照自己的意愿过这一生。这份象征意义迄今犹在。

1970年5月之后的几个月，政治事件发展迅速。第一个法国妇女团体就在那年夏天成立。我9月加入。第二年春天，MLF*发起轰动的反对人工流产禁令的运动。三百四十三位妇女——包括数位极为著名的妇女——公开宣布

她们曾经堕胎，并要求每位妇女享有同样权利。西蒙·波娃也是其中一位。

才不过几个月之前，法国第一份女性主义集体刊物《零年》还曾经因为波娃“唯萨特是从”而拼命找她麻烦，更不满意她替男性刊物《现代》写稿。如今西蒙·波娃回忆起来，还说：“我那时候很生气。”

然而，就在同时，有些参与妇运的女士主动与她接触，请她加入。她自然而然，毫无顾虑地答应了。对我们女性主义者而言，她这么做不仅表示了大力支持，而且是极大的鼓舞与肯定。

从此之后，对与她一起从事政治活动，或者倾心相交的妇女，她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事情。对某些激进的左派而言，萨特是他们的“同路人”，同样的，对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而言，波娃扮演了类似的角色。她除了一向支持政治性的抗议行动之外，也参与多种单一性目标的运动，并且提供宝贵的策略。例如在1974年，她建议模仿“人权联盟”的形式筹组“女权联盟”，至今她仍然担任主席。

从1970年底开始，我和一些其他妇女与她共同从事政治活动。活动项目之一为成立非法堕胎联络网，并且把新的不需开刀的抽吸堕胎法引进法国。在当时，我们完全无法预料蓬皮杜政府是否会采用高压手段对付女性主义者。所以为了掩护我们自己，头几次的堕胎手术我们选择在“知名人士”的公寓进行（若事情一旦闹大了，真的会震惊社

* MLF (Mouvement de la Libération des Femmes) 是法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激进团体。

会!), 西蒙·波娃毫不犹豫地提供她的公寓。

我们的堕胎合法化运动所引起的激荡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女性主义运动初期只有几十人参加。到了1970年秋季, 单只巴黎一地, 激进分子就有数百人。1970到1971年间, 迅速扩展成一股政治力量, 受到各派人士注意。1971年11月11日, 争取堕胎权的游行有三、四千名妇女参加, 西蒙·波娃亦在其中。

同时, 我们计划在1972年2月于巴黎互助厅举办“告发对妇女罪行日”的活动。少数几位妇女, 西蒙·波娃在内, 负责计划和组织。MLF从成立之初就包容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和见解, 我们慢慢看清楚, 在这个组织之内, 西蒙·波娃对她接触的对象都慎重选择。偶尔, 她会主动接触一些从唯物观出发来分析妇女(及世界), 而且绝不相信“妇女有其天性”之说的女性。象安妮·季蓝斯基(Anne Zelensky), 与波娃同属于“女权联盟”中的活跃分子, 克里斯廷·德菲(Christine Delphy), 女性主义理论性刊物《女权问题》(Questions Feministes)的主编, 以及多年来与她一同为《现代》杂志编辑《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歧视》专栏的妇女们。

我们都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波娃。起初, 我们对她又尊敬, 又亲密, 不久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喜爱她。每次工作集会她都准时到场(她一直深为痛恨不守时), 而且马上进入情况。她对事情洞彻的分析力以及对习俗全然的漠视(对她而言,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, 都不觉得过于偏激), 相当有助于我们的讨论。而同时, 她的风度又极为优雅。

她端庄的坐姿, 皮包搁在膝上……

那是一段创造性的岁月——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性，政治性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。晚间的集会、活动、讨论、餐会。与波娃共进晚餐成了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个项目。我们轮流煮饭(但是她从来不做。她讨厌做饭!)。通常我们共有六至八人，全是女性。我们又吃、又喝、又笑、又订计划。

就是在一次晚餐会中，我们有了由我访问西蒙·波娃的构想，这么做有两个主要的原因。首先，我觉得应当让世人知道《第二性》的作者已“改信”女性主义——过去她总是与女性主义保持距离，而且常常声称，一旦实行社会主义，妇女问题自然解决。此外，理由更简单，我们需要钱租下互助厅作为“告发对妇女罪行日”活动的场地，租金共需一万法郎，我们已筹到八千法郎，然后把我的第一篇访问稿卖给法国的《新观察者》周刊，得款二千法郎。

那篇访问缔造了历史。那是1972年初登出来的，正当所有西方国家的妇女运动坚持自己的独立性，而与左派发生冲突之时，而许多激进的妇运人士原来是属于左派的。

就在此时，西蒙·波娃公然宣称“我是女性主义者”，她投身于争取与其他党派分离的自主的妇女运动。这篇访问被译成多国文字，包括日文，其盗印本也在许多妇女团体间流传。

一年后，我替西德电视台做了一个西蒙·波娃专访——我的主要职务是替西德广播电视做驻外特派员。虽然过程甚为繁杂，而且必须顾及烦人的细节，她还是喜欢拍摄的过程——她很爱看电影。本书《我们不是不可批判的》一文中，西蒙·波娃与萨特回答有关他们两人关系的谈话即取材于这次访问。这段影片是1973年9月在罗马拍摄